

# 近代报刊与士林格局

## ——以戊戌湖南“新旧”分野为例

朱至刚

(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在戊戌时期,士绅阶层在维新建设中至关重要。在士林中的既有地位高下,决定着参与者选择的优先次序。从事报业等文化建设,能给当事人带来的收益主要是名望而非经济收益,而且对名望的提升度亦有上限。但当学堂、学会、报刊渐次开办,连贯一气后,却又在士林中形成了新的人脉体系和交往网络,对既有的交往秩序、利益分配形成了潜在却强劲的冲击,进而引起了“新”与“旧”、“前辈”与“后辈”之间的纠葛。湖南的维新建设属公共事业,举凡湘绅,都有资格来干预。所以,在士林的交往规则中,两派之间的争执并无明显的是非曲直,只能是以势相抗,愈演愈烈,最后两败俱伤,从整体上折损了湖南绅界影响公共事务的资格与能力。在此过程

中,《湘报》既是“新派”掌握的斗争利器,又是促使矛盾不断升级、再无回旋的诱因。

[关键词]湖南 “新旧” 《湘报》

[作者简介]朱至刚(1979—),男,四川省乐山市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3-0149-08

### 一、何以报人皆新人

何以戊戌时期的精英报业,主持者皆系“新派人物”?这在既往的报刊史叙事中,似乎不言自明:若非维新中人,怎会接受报刊这种“新生事物”?与之相应,举凡被界定为守旧的人物,对报刊的态度,通常也被描述为多方阻挠。然而,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推进,这种看法已不大站得住脚。<sup>①</sup>既然所谓“旧派”人物,对报刊本无成见,甚至还颇为支持,为何却没有亲身参与?须知王先谦在戊戌时期已退居林下,不必如在任官员那样颇有忌讳,他又向来无利不图,为何会放任后辈独占报业风光?<sup>②</sup>

其实,问题的要害,恰在“收益”和“前辈”。自甲午至戊戌,全国上下咸与维新,种类繁多的新兴建设

在人力上常得借重当地士绅。同时,对于士绅而言,也是获取收益的重要渠道。较之同等类型的内陆省

① 仅以本文将论及的王先谦为例,光绪二十二年年底,他就曾以岳麓书院山长身份,劝谕诸生阅读《时务报》,事见江标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2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 当时在职官员的顾忌,可从黄遵宪光绪二十二年八月致汪康年、梁启超函中看得比较清楚。“谓稷卨勿视为性命身心之学,谓卓如当为敖前七伏,畏首畏尾,不敢为然。以吾辈三人计,弟身在宦途,尤畏弹射,然公然明目张胆为之,见义则为,无所顾忌。”(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3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敖前七伏”,当系典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土季使玁狁、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故上军不败。赵婴齐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败而先济。”覆通伏。原意是指伏兵七处。黄遵宪显然是要劝汪康年、梁启超放开手脚,自己却要避嫌。本文正文与注释中所及日期,均为夏历。

区,在湖南从事维新,又几无风险可言,时任湘抚的陈宝箴对维新建设,不仅没有设置人为阻碍,还常动用公帑支援。但湖南经济、文化水平本欠发达,能借助的公共资源也数量有限。<sup>①</sup>因此,官方支援,尤其款项资助,势必成为想做番事业的湘士须全力争取的对象。省内各地区的发展又很不均衡,在籍贯湘士中的精英大多集中到岳阳—长沙—湘潭—衡阳一线,省会长沙更是各色人等齐集于此。<sup>②</sup>

资源既然稀缺,又缺乏周旋空间,分配规则就显得尤其重要。湖南的士林偏偏又是学术流派上纷繁各异,几近平分秋色。既然在交往格局中,单就学术声望,谁都不能“以理服人”,那就只能唯势是从。戊戌时期,科举仍是持续性批量造就士绅乃至高官的主流路径。咸同以降,湘籍高官一度数量激增,但多是因军功擢升,湘士在会试中的表现并未显著提升。<sup>③</sup>因此,湘士虽盛极一时,较之江南、直鲁等传统科举重镇,却难以为继,到了光绪二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出现了明显衰退。连带使得湖南本省也难以产生新的精英人物和地方豪族,士林格局逐渐呈现出板结趋势。<sup>④</sup>垂直流动不畅,导致利益分配格局凝滞。既有的头面人物,长期保持、垄断优势地位。

在这样的局面下,甲申之后、戊戌之前,综合官位、名望、资历而论,王先谦不仅是在籍湘士的领袖,而且地位长期稳固。以往的相关研究常把视线集于在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保卫局,很容易得出在此期间,“新派”暂时得势而“旧派”暂时失势。<sup>⑤</sup>但以湖南所有维新事业为考察范围,不难看到“旧派”不仅也参与了诸多项目,还始终掌控诸如宝善成制作公司、湘鄂通轮等获利可能性最大的实业。而在可由本省人士出任的公职中,岳麓书院山长地位最为崇高,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开始,王先谦在这个位置上稳坐了十年。<sup>⑥</sup>

既然湖南的维新建设大都依赖公帑,在名分上属于公共事业。身为士林班首的王先谦自然能对是否参与某项具体事务,拥有充分的选择优先权。其他士绅,尤其是后辈中人,至少也不能和他发生直接冲突。叶德辉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的学术流派与王先谦原本不同,还曾在门人面前讥讽:“恒言阁学师(王先谦)不出桐城古文范围,于经学有中年出家之弊。”<sup>⑦</sup>但出于现实考虑,他始终跟王先谦关系极为亲密。这种“前辈”与“后辈”的分量差异,在王先谦与熊希龄在维新建设早期的交往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在原先的规划中,时务学堂原本只是宝善成制

造公司附设的工艺学堂。光绪二十三年正月,湘绅集议,准备由联名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求援,请求从他辖下的湖南盐政督销局每年拨付一万四千两白银作为办学经费。事到临头,王先谦却又不愿意署名。因此,赴宁见刘的差使就由熊希龄和蒋德钧负责,而且使用的是时务学堂,而非宝善成公司的名义。<sup>⑧</sup>光

①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以王树槐在《庚子赔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中所列数据,最能说明戊戌前后各省经济发展水准的相对高低。据该书第140页所载,光绪二十七年,为筹措赔款,中枢分配给湖南的任务和湖南自认数额分别是每年70万两和20万两,分列内地18个省份的第11位和第8位(有5个省份未报自认数额)。又据该书第148页,最后确定为69.6万两,在18省中仅高于甘肃、新疆、广西、贵州、云南,不及江苏、四川、浙江,和紧邻的湖北的一半。又据张朋园的统计分析,湖南在光绪二十年前后,岁入约为300万两,庚子以前尚略有结余,但在分摊每年约70万两赔款后,虽然开征多种税捐,仍从光绪二十九年始,每年出现赤字50多万两(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历程(1860—1916)》,第248页,长沙,岳麓书社,2002)。由此可知,湖南在维新期间的机动财力,当不足每年20万两。而同一时期,湖北全省财政收入在每年700万两左右(参见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第218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② 以此时湖南士林中的知名人物,尤其是“新旧”两派骨干为例。除叶德辉籍贯江苏,寄籍长沙外,王先谦、皮锡瑞、张祖同、毕永年是长沙人,蒋德钧、张通典是湘乡人,谭嗣同、唐才常是浏阳人,王闿运是湘潭人。籍贯相对偏远的樊锜(邵阳)、熊希龄(凤凰)、邹代钧(新化),此时也都在长沙。

③ 阳信生认为,以1850年庚子科为界,此前湖南进士约为每两科9人,此后约为每科11人,“可谓一时之盛”(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第73页,长沙,岳麓书社,2010)。但据朱宝炯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检索结果,从道光二十年咸丰十一年,共开11科,取中进士3536名,其中湖南人28名,占到0.7%。从同治元年到光绪二十一年,共开17科,取中进士4537名,其中湖南人53名,也是占到1.1%。

④ 根据《清代职官年表》检索结果,同治四年(1865年),在任湘籍大学士、尚书、侍郎4人、督抚10人(总督6人,巡抚4人,除去曾国藩身兼大学士和总督,共13人)光绪二十年,仅有5人(侍郎2人、总督2人、巡抚1人),且只有1人(刘坤一)系军功出身(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696、1478、1493、1708、17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⑤ 代表性观点见何文辉:《失势的精英及其反抗: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的政治学分析》,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5)。

⑥ 光绪三十年(1903年),岳麓书院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才改由江苏籍的陈庆年出任学堂监督。应该是改制以后,学堂是正式的官方机构,作为在职官员,监督必须原籍回避。

⑦ 《郎园学行记》,载《近代史资料》,第57期,第1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该文向来被认为可能出自杨树谷、杨树达兄弟。

⑧ 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册,第5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转引自周秋光:《熊希龄传》,第73页,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绪二十三年四月,在熊希龄和蒋德钧的软磨硬泡之下,刘坤一居然同意每年划拨七千两给湖南。此后不久,跟王先谦向来亲密的张祖同却又提出要分出一半,另设一所工艺学堂。站在熊希龄的角度,对王先谦推诿在前,争利在后有所不满,自在情理之中。但即便如此,他对王先谦仍处处礼让。就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不得不撕破脸的时候,也得尊声“益吾师”。<sup>①</sup>

较之矿务、交通、机械等实业部门,报刊、学会、学堂等文化事业在经济上基本无利可图。例如《时务报》,它的销售规模和运营绩效都居维新报刊之冠。光绪二十二年下半年,共收入 18958 圆暨 1581 两,但全馆员工 15 人,同期所得薪水只有 2893 圆。<sup>②</sup>《湘报》的主要经费是来自湖南抚署提供的每月 200 两津贴,油水又能多到哪里?相形之下,由王先谦主持的宝善成制造公司。光启动资金就有近 6 万两。<sup>③</sup>自然,投身报业、学堂、学会,主持人在承受政治风险的同时,也会获得名望的提升。然而,是否需要这样的提升路径,却因人而异。此前,因投身报业而得文名的莫过梁启超。但对他甚为推崇的黄遵宪、伍廷芳、吴德潇、谭嗣同、陈三立等人,都还不在于社会的最顶层。下面这段文字出自王伯恭《蜷庐随笔》,常被引用来说明梁启超受到的器重和礼遇。“当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过武昌投谒,张令开中门及暖阁迎之,且问巡捕官曰,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闻对,乃已。定制钦差及敌体官往见督抚者,始鸣炮开中门相迎,若卿贰来见,但开门而不鸣炮,余自两司以下,皆由角门出入。梁启超一举人耳,何以有是礼节。是时已有康梁柄国之消息,香翁特预为媚之耳。启超惶恐不安,因著籍称弟子。”<sup>④</sup>但姑且不论是否属实,按照当时惯例,举凡翰林院庶吉士到地方官署拜会,因为并非直接属官,督抚纵然地位崇高,也必须以客礼相待。纵然真有此举,也恰足说明梁启超在他那里,分量也不过就是与新科翰林相若。王先谦则早在同治四年就入了翰苑,累迁翰林院侍讲,光绪六年(1880年)任国子监祭酒,光绪十二年(1886年)更外放江苏学政,江苏人文荟萃,学政分量远过他省。历数科名、资历、地位,王先谦在举国士林中都是一流人物,通过投身维新提升名望,对他而言实无必要。可以说,在光绪二十三年的王先谦那里,报刊原本就是精力有限,难以兼顾的边角余料。熊希龄在光绪二十年成为翰林院庶吉士的时候,仅有二十

四岁,在江南不足为奇,在湖南却凤毛麟角。加上为人勤勉,做事周到,很快得到了湖南官绅各界格外推崇,尤其是为陈宝箴所青睐、器重,堪称湖南“后辈”中的顶尖人物。对王先谦而言,形同鸡肋的文化建设,在他那里却既正好位份相符,又可自成局面。

纵观光绪二十三年的湖南情形,在士绅这个精英群体中,以王、熊为各自代表,“前辈”与“后辈”分任实业与文化方面的维新建设,实属共同生存的情境、共同认可的规则使然并非“旧人”与“新人”原本就存在路线差异。此时维新运动建设的具体方向和任务分配,对于原有格局不仅并无结构性冲击,反而会使“新人”和“旧人”都能按照既有规则有所获益。

## 二、“新人”籍何成“新派”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湘报》终于面世。在后人转述中,它俨然是戊戌时期最具革命性和战斗性的报纸。其实,单就内容来看也并非如此。到九月一日停刊为止,《湘报》共出 171 期,刊登论说 98 篇。此外,该报所设“南学会讲义”和“南学会问答”两栏目,也能起到表达意见的效果。

据吴仰湘考定,南学会共开讲 13 次,共 45 人演讲,《湘报》刊出了其中的 23 次。<sup>⑤</sup>“南学会问答”共刊出 37 期,共有 45 人发问 53 次,答语则未署名。询问者在提问时,大多详尽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及相关依据,单篇多在四百字左右,倒不如说是在撰写短论更为贴近。以上三类论说共 180 篇,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底,也就是“新”、“旧”两派公开失和之前,共发表 152 篇,从所论的话题看,除 8 篇论及自然科学和工艺,大多是在就事论事,具体探讨湖南维新建设应如何展开、此前举措还存在哪些问题。

既然内容并非格外激进,为何《湘报》甫一出刊,就成了众矢之的?自然是因为到此时,“新”、“旧”关系已经激烈恶化。已经从事务分任蜕变成派系对立。然而,双方关系何以在急转直下?此前研究或

① 《湘报》第 112 号,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第 1060 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② 《时务报》第十八期《丙申年五月至十二月收支实数开呈》,《强学报》,《时务报》第 1242 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 年。

③ 王先谦:《致陈右铭中丞》,见梅季标点:《葵园四种》,第 854 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④ 王伯恭:《蜷庐随笔》,第 90 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⑤ 吴仰湘:《南学会若干事实考辨》,载《近代史研究》,2001(2)。

是归因于地域观念,或是聚焦于“新”、“旧”中学术流派、维新设想等方面的分歧逐渐显现、不断激化。<sup>①</sup>但若从士林既是由观念维系的共同体,也是分配利益的结合体来看,也可有另一番图景。

追因溯源,时务学堂实际运作与原先设计之间的巨大差异,实是其中关键。须知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学堂”和“书院”的区别并不仅在名称与授课内容,更重要的还在于培养的目的。学堂旨在培养专才,书院却要孕育通才。<sup>②</sup>在科举制度尚未废除,且以经子之学为考试内容,制艺策论为考试科目,身为专才就极有可能将与功名绝缘,社会地位与上升空间远不及科第中人。如时务学堂真如此前已有的船政、路矿、水师等学堂,对于岳麓、城南等书院,并不构成竞争,反能聊为补充。因此,王先谦开始对此也乐观其成。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两派已经失和,熊希龄在禀帖中历数王先谦、张祖同等人在梁启超莅湘之初,曾建议“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普请各绅以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叶德辉也对门人石陶钧说:“梁先生讲公羊,你无妨从而学之。”<sup>③</sup>自然是要证明王先谦、叶德辉反复无常。但仔细推敲,王、叶彼时对梁启超的态度,只能说是热情接纳,还有些居高临下,叶德辉本身就是公羊名家,“无妨”二字就更话里有话。实际上,入湘前的梁启超,很少公开宣扬康门学说,在士林的公共视线中,他还首先是新学、西学专才。

也许大出王先谦等人的预料,梁启超还未到湘,就力荐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来湘担任中文教习,湘土中比他们更胜任经子之学的俯拾皆是,为何要舍近求远,请来的又都是同门?当然,梁启超也曾解释这是出于“分教习必由自行聘定,乃易臂使”,但唯有同门,方能谐作?<sup>④</sup>除了人事配置,课程内容也与此前设计大相径庭。以公帑设学堂,原是为传授西学、实学,所谓“中文”、“西文”的区分只在通识性的基础课程,重头本是此后的工艺课程。但梁启超却提出要“学分两种,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为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学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四门,“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这样才可以“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而不学西学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sup>⑤</sup>不难想见,出于前程考虑,相当部分学生会选择接受书院式的教育。果然,在光绪二十三年八月考入的头批 53 名学生中,就有 21 人选择了“外

课”。<sup>⑥</sup>此后,在梁启超的主持下,中文课程蔚然大宗,不仅于工艺器物少有涉及,而且将大量时间用于宣扬民权、平权等政治观念。如此运作,与其说是“学堂”,不如说是另立了一所书院。可以想见,假以时日,时务学堂,至少是其中书院部分的师生势必会在湖南形成既受到主流社会认可的新兴群体,他们在学缘上,与岳麓、城南毫无关联,却与万木草堂脉络相承。这极有可能对湖南学界,乃至士林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冲击。梁启超与蔡锷的关系,不正奠定于此?这对王先谦等人在湖南士绅中的优势地位,当然是虽然潜在,却相当严重的威胁。

康门弟子所以会大举入湘,又在公共场合如此高调,的确有所图。随着俄德在东北、华北的咄咄逼人,新一轮外患高潮迫在眉睫。维新各派对地处腹地,形势还颇有可为的湖南期望殷切,希望它能够迅速开化,为国族保存一线生机,梁启超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sup>⑦</sup>在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那里,

① 这两种观点,分别以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罗志田:《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侧重于王先谦与叶德辉》(载《历史研究》,1998(5))为代表。

② 谢丰在《从书院到学堂的三次变化》(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中认为从书院到学堂,这不仅仅有教育机构名称的更替,也包括以学习西方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教育内部各要素的近代转化,还包括了从传统松散的、与科举分途的教育组织机构到建立合科举为一途的近代国家教育系统的三重变化,对笔者启发甚大。

③ 熊希龄:《上陈中丞书》,《湘报》第 112 号,第 1059 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④ 梁启超:《致陈三立、熊希龄书》,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9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⑤ 梁启超:《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 53—5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⑥ 数据来自李玉:《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人数考》,载《近代史研究》2000(2)

⑦ 另据来自康有为的说法:“因陈右铭之有志,故令卓如入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故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卓如与复生入湘,大倡民权,陈、黄、徐诸公听之,故南学会、《湘报》大行。湘中志士于是斐然奋起,人人种此根于心中,如弟所云是也。”(康有为:光绪二十七年《致赵日生书》,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9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当然,根据康有为的一贯作风,此说未必全然可信,比如说按皮锡瑞的说法,谭嗣同回湘是因为受张之洞派遣促办铁路轮船(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 年,1959 年),但却可以解释为何除了梁启超外,其他康门弟子也会入湘。

以湖南为基地，“文明排外”的构想颇受认可。<sup>①</sup>熊希龄身为学堂总办，却未对康门子弟有所抑制，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此。梁启超到湘后，和熊希龄、谭嗣同意气相投，上通黄遵宪，旁联黄自才、张通典、唐才常，又与接踵回湘的皮锡瑞，身在江宁的蒋德钧声气相通，再加上陈宝箴的器重，的确形成了在湖南士林中虽然新兴，却声势显赫的“志士”群体。既以“以湘救国”为共识，对内日益亲密，对外门户日深。就连带同属维新阵营的邹代钧都难以忍受，抱怨“鄙人为时务学堂事，竟与谭、熊为深仇，谭虽得保而去，熊则仍据此间，动辄以血流成河为言，且形同无赖，似难与计较”。<sup>②</sup>

时务学堂的诸般举动，却又是在湖南所有士绅的视线范围内。既然“新人”以如此姿态，渐成“新派”，无论是出于身为湘士的地域心态，身为既得利益者的现实需要，还是学术品位，其实未必守旧的湘中“旧人”自然亦复聚合。光绪二十四年正月，梁启超离开湖南，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和激进倾向却一仍其旧。但此时“新”、“旧”虽已各自成派，却还没有公开失和。在“旧派”那里，诚然是缺乏发难的借口，也是因为“新派”崛起对他们的威胁毕竟还只是潜在，而非迫切。在“新派”那里，不仅力量还有不足，而且与乡贤前辈公开对抗，也超过了士林交往规则所允许的范围。例如熊希龄就曾受教于岳麓书院，跟王先谦有师生名分。因此到光绪二十四年年初，“新”、“旧”两派之间还没有发生过以群体为单位的公开冲突。该年二月初一，在“新派”主导下，成立了南学会，“旧派”既不参与，亦不反对。<sup>③</sup>

《湘报》的出现，却打破了局势的平衡。到目前为止，《湘报》在各个时期的具体发行数字还无从确定，但从间接材料可知，每期印数在五六千份左右。出于扩大阅读面，《湘报》不仅售价低廉，还试图在穷乡僻壤免费张贴。<sup>④</sup>按每份三人传阅计，《湘报》的读者也至少有一万五千人。以当时的文教状况而言，其中绝大多数应是散布于全省各地。反过来看，这也覆盖到全省正途士绅的三分之一左右。<sup>⑤</sup>随着《湘报》的延续，“新派”人物的社会知名度自然会出现上升，社会地位与影响力也会随之提升。这种提升对熊希龄、谭嗣同来说，也许只是锦上添花，但对作为整体的“新派”，却并非如此简单。

据笔者粗略统计，《湘报》刊登的180篇论说出自100位作者。除康有为(1篇)、梁启超(3篇)、洪文

治(1篇)、徐勤(1篇)、陈宝箴(2篇)、李维格(1篇)、黄遵宪(2篇)外，其余169篇出自93位湘士。从科名看，这93位湘人，在光绪二十四年以前，只有熊希龄、曾广钧两人是进士。从官位看，除曾广钧曾任广西知府、谭嗣同是候补知府以外，其余人等也均无官衔，而且谭嗣同也是未得实缺的捐班。从乡绅的角度看，除了谭嗣同，其他人等也并非出身于地方豪族。可以说，除了熊希龄、曾广钧、皮锡瑞、谭嗣同，至多再加上已颇有文名的唐才常和樊锥，其余的87位作者都还是士林中的低端人物。在既有的以官位、功名、资历为尺度的差序格局下，对于公共事务，他们基本上不具备发言的资格。然而，《湘报》的出现，却使他们获得了纵论省事乃至国事的机会。

《湘报》论说的作者之多、篇数之分散、多数作者地位之低、地域之集中。在与《时务报》的对比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加上改名后的《昌言报》，《时务报》共出79期，刊登论说102篇，共出自31位作者，其中发文3篇以上的，共有梁启超(39篇)、汪康年(13篇)、麦孟华(6篇)3人、陈炽(署名瑶林馆主，3篇)占

① 例如，熊希龄在与皮锡瑞、谭嗣同等人集议时认为“此一二年内，西人未必窥湖南，将来诸事办成，民智开通，或可冀起不来，即来而我属文明之国，不至于受其鱼肉”(转引自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载《湖南历史资料》第4辑，第125页，1958)。虽然这次集议是梁启超已经离开湖南的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四，但是从熊希龄等人此前的作为来看，“文明排外”应该早被他们认可。

② 《邹代钧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致汪康年函》，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7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③ 王先谦曾在《复吴生学箴》中提到，在南学会开办初期，“学堂、学会，先谦皆曾到场。以学堂系奉旨建立，学会则中丞殷殷注意，随同前往，然皆仅到一次。因先谦事忙，并非有所避忌而不往也。”(转引自李和山：《王先谦学术年谱》，苏州大学2007年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又据熊希龄《上陈中丞书》提到，“南学会开讲之日，王益吾师又与龄言谓张雨珊深诋，此事(电灯)嘱以后不必相约”(《湘报》第112号，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059页，2006)，可见王自己说曾莅临南学会，其言不虛。

④ 发行量数字来自辛文思《〈湘报〉与〈湘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1982(3))。另据《湘报》第29号登载含邮费在内，湖南各地订购本报的价格(《湘报》，第231页，中华书局影印本，2006)。其中包括宝庆、永州、岳州、郴州、澧州、益阳、湘乡、湘潭、洪江、平江、衡州、常德、沅州、辰州各地，覆盖了湖南全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宝庆府为例，售价每张制钱7文，根据《湘报》自己刊登的物价表，当时米价约为每石3000文左右。

⑤ 据张仲礼的统计，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湖南具有文生员及以上功名者，当保持在35469人左右(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168页，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到了总篇数的 59%。前三名都是《时务报》报馆人员,陈炽是在任军机章京,汪康年是进士,梁启超虽然以文而名,毕竟也是举人。《湘报》刊登的 180 篇论说中,发文 3 篇以上的,共有唐才常(13 篇)、皮锡瑞(12 篇)、谭嗣同(9 篇)、杨子玉(5 篇)、樊锥(5 篇)、熊崇煦(3 篇)、黄熙敬(3 篇)、曹典球(3 篇)、黄颂奎(3 篇)、周骥(3 篇)9 人,总共只占到篇数的 32%,他们大多不是报馆成员,其中只有皮锡瑞是举人,而且他主要以学术知名。

除了转刊的南学会演讲以外,在其他论说作者中,只有康有为(1 篇)、熊希龄(2 篇)2 名进士、梁启超 1 名举人(3 篇),康有为和梁启超各有 1 篇是转载,出自熊希龄的 2 篇,首先是向陈宝箴呈上的禀帖,都不是为《湘报》撰写的专稿。从署名上来看,《湘报》的 180 篇论说有 179 篇是实名发表,而《时务报》(含《昌言报》)的 102 篇中,至少有 13 篇使用的是匿名或者化名。<sup>①</sup>《时务报》的论说作者来自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江苏、广东、京师 8 个内地省份和美国。《湘报》论说的作者,集中在江西、湖南、广东、浙江 4 个省份,湘人占到了作者人数的 96%,总篇数的 98%。由以上情况,可以看到相对于《时务报》,《湘报》的论说作者具有远为鲜明的地域性、基层性色彩,表达机会也更分散和均匀。《时务报》在全国范围内,只造就了梁启超,提升了汪康年。《湘报》是在湖南一省,让众多士林中的基层分子得到了被社会关注的机会。

然而这一“众多”,较之士人总数,依然极为稀缺。毋论童生,通省生员就不下 3 万,何以仅 87 人能得到这样的机会?<sup>②</sup>果真就是见识、文采高出同侪?对照《湘报》论说的作者、南学会会员、时务学堂师生这三份名单,就可见其中端倪。被《湘报》登在头版的论说共有 98 篇,除 1 篇未刊作者姓名,其余 97 篇共出自 36 位作者,除去康有为、梁启超、徐勤、洪文治、唐才常、熊希龄、樊锥、曾广钧 8 名“著名作者”,28 名“非著名作者”中,至少有郑宝坤、黄颂奎、张伯良、蔡良寅、曹典球、谢功肃、向振翔、向佐周、贺嵩寿、许崇勋、杨昌济、辜天佑、江跃龙 13 人是时务学堂的学生。<sup>③</sup>此外,南学会会员戴德诚、何来保、毕永年、罗棠、周会昌、熊崇煦也名列其中。在“南学会问答”中,藉提问而立言,更是会员专利。由此可见,是否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成员,是否与“新派”的关系亲近,是能否在《湘报》上发言的关键因素。《湘

报》对此也毫不讳言,在刊出学堂课稿的同时,公开宣示:

以上均系时务学堂头班学生所作课卷,外课生约得五十余篇。前三月间,本拟登报(国闻报例天津学堂学生课卷皆登报),因各学生年幼气盛,恐反长其骄满之习。特抑之而不,各学生勤苦向学之诚实,近来学堂所稀有。自去年九月考取,所作文字不过粗通(原卷尚在学堂),及十一月入堂后,中间年假、事假、节节延搁,每人读书之功计日只得一百二十余天,而猛进如此,深可嘉也。且西文尤比中文为胜,头班学生现已读文法书矣。湖北某学堂,自去年五月开学至今,尚不及此学堂头班学生之捷。两两比例自知虚实,独惜变故,忽乘铁,为德不卒。湖南办事在人之先,成事居人之后。气运如此,夫复何言?现因报馆迁徙对门,须十五日方能出报,以后学生文字,逐日续登,以供众鉴,特此声明。<sup>④</sup>

这段文字刊登于六月二日,正是《湘报》因为官方停止资助,暂且停刊的前夕。其情可悯,但字里行间,对本省人士和外省同行的自负却相当张扬。再从论说的倾向来看,只有第 52 期“南学会问答”栏所刊陈其殷的两则短论,对办学、办会的宗旨略有责难。也就是在当期的答语中,就被数落了一顿,《湘报》把它们刊登出来,与其说是各抒己见,不如说是树个靶子来批驳。须知时务学堂和南学会自从开办以来,就颇受争议,《湘报》的内容倾向是否与士林的意见状态相符,实在很成问题。

既然学会、学堂和《湘报》使用的都是全省公帑,就理应是全省公器。然而以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为中枢,却连贯一气。学会、学堂组成的写作群体,

① 它们分别是《中日之战六国皆失算论》(瑶林馆主,第 10 期)、《近代政教之原》(某君,第 63 期)、《崇实论》(琼河庄客,第 67 期)、《论阴扰新法之害》(读有用书室主人,第 67 期)、《愤言》(海藏楼蒿目居士,第 68 期)、《俄人国势酷类强秦论》(瑶林馆主,第 18 期)、《贵私贵虚论》(瑶林馆主,第 18 期)、《上某观察书》(某洋员,第 28 期)、《炮台新制》(求在我者,第 31 期)、《枪不杀人》(求在我者,第 30 期),另有《中国缠足一病实阻自强之机并肇将来不测之祸说》(第 35 期),署名为黄鹈生,是真名还是化名,待考。

② 参见前页注③。

③ 参见李玉:《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人数考》[载《近代史研究》,2000(2)]所列名单。

④ 《湘报》第 116 号,第 1107 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可以为报刊稳定地提供大量而同质的稿件；报刊可以为学会、学堂的言论和意见，提供其他传播方式难以企及的传播速度和传播空间。可以想见，稍假时日，以熊、谭、唐等“后辈”聚合而成的“新派”为中心，势必形成人数众多，观念一致的共同体，在湖南士林中，重塑新的人脉网络，这对全省读书人，乃至全省社会权势结构造成的影响岂可小看。交往结构的这种重塑趋势，自然会进一步威胁到已和“新派”貌合神离的“旧派”。

### 三、以报馆为承载的“新”、“旧”党争

然而，较之学会和学堂，《湘报》既是公开出版，发行数量与覆盖范围亦复可观。如果存心要拿报刊内容来作为寻衅切口，证据不但易得，而且还确凿。况且“新派”在《湘报》上所发的议论也颇有授人以柄之处。例如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易鼐撰写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议》在《湘报》上赫然面世。该文提出四项主张：一、西法与中法相参加；二、西教与中教并行；三、民权与君权两重；四、黄人与白人互婚。目睹这番言论，就连陈宝箴也是震惊之余委托欧阳中鹄转告熊希龄此言“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sup>①</sup>但“新派”同仁既图存心切，又未能体会陈宝箴、欧阳中鹄曲意维护的用心，反而跟陈氏父子发生了公开冲突，这就给“旧派”创造了机会。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十位湘绅联名向陈宝箴呈送《湘绅公呈》，要求另委中文总教习，并指名道姓地点出了韩文举、叶觉迈、樊锥、易鼐等人，要求将他们逐出时务学堂。按照署名先后，他们的情况见下表 1。<sup>②</sup>

表 1

| 姓名  | 官位        | 功名、科次       |
|-----|-----------|-------------|
| 王先谦 | 国子监祭酒、致仕  | 进士、同治四年     |
| 张祖同 |           | 举人、同治六年     |
| 叶德辉 | 吏部主事、请假在籍 | 进士、光绪十八年    |
| 刘凤苞 | 云南补用道、致仕  | 进士、同治四年     |
| 孔宪教 | 在籍候补道     | 进士、光绪十二年    |
| 汪槩  |           | 进士、光绪六年     |
| 蔡枚功 | 户部员外郎、在籍  | 进士、光绪六年     |
| 黄自元 | 宁夏知府      | 进士(榜眼)、同治七年 |
| 严家骥 | 华容县教谕     | 举人、同治三年     |
| 苏舆  |           | 拔贡、光绪二十三年   |

此着厉害之处，就在于抢先使用了“湘绅”名义。由上表可知，不管动机如何，这十人的地位和资历，的确可代表湖南士绅。既然时务学堂是湖南通省的

公共事业，他们当然有资格公开表达意见。何况此时梁启超已经在京被委以官职，中文总教习也确实需要另有聘任。还在接到公呈前的两日，陈宝箴就已经免去了熊希龄的学堂总理之职。五月二十六日，熊希龄联合黄膺、戴德诚等人，也呈上《公愚抚辘整饬通省书院稟稿》，目标直指王先谦。正如“旧派”有资格干预时务学堂，同样也是湘绅的熊希龄等人，也有权过问同为公共组织的书院。

单就公启和稟帖内容来看，诸如此类的相互攻击，历来并不鲜见。如果仅以这样方式来表达意见，毕竟还是士林高端的内部争斗。须知公启与稟帖都是以抚署为呈送对象，传播范围相当有限，能够直接看到的人为数不多，而且，有资格看到的人士，往往既对中由来龙去脉不至一无所知，又与当事人有些瓜葛，不大可能仅凭各自的一面之辞，来认定事件的面目和曲直。在这样的交往状态下，即便把话说得再激烈，也未见得就能对事态进展产生多大影响，时过境迁后，关系未尝不可修复，即以湘土前辈为例，在左宗棠和郭嵩焘之间，就曾发生类似事件。但与此前故事不同，此时“新派”掌握了报刊这种虽然新出，却已开始改变交往格局的媒介。不待陈宝箴做出回应，《湘报》就在次日将《稟稿》全文刊登。二十七日，又跟进刊出熊希龄所撰《上陈中丞书》，以坊间传言的“学堂不应该请粤人为分教习”为由，历数“新”、“旧”两派的纠葛恩怨，痛斥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跟自己处处存心为难，事事出尔反尔，并公开表示已经对王、张、叶的心术深为怀疑，“此后龄若死于非命，必王益吾师、张雨珊、叶焕彬三人之所为，即以彼命抵偿焉可也”。<sup>③</sup>

此前，王先谦诚然因为颇多微行颇遭议论，但被如此抨击，却是首次。更重要的是，是被拉到公开发行的报刊上斥责痛骂。诚如前揭，《湘报》的读者为数众多，其中的绝大多数，既是士林中的基层分子，对争议的前因后果、当事人的为人处事，并不见得就跟圈内人既大体明了，又各有立场；但同时却又毕竟

① “前睹易鼐所刻议论，骇然汗下，亟告秉三收回，复囑其著论救正，此外所刻亦常有矫激，迭经切实劝诫。近来始无大谬。”《陈宝箴光绪二十三年闰三月二十三日复张之洞电》，见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60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

② 叶德辉编：《翼教丛编》，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7。

③ 《湘报》第 112 号，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1060 页，2006。

是读书人,在各自所在的小地域、小范围内,也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公信力的意见领袖。这样一来,在全省士林中,王先谦等人的公共形象当然倍受打击。

“旧派”的应对也算及时,叶德辉立即出资将《湘绅公启》刊刻散发。但《湘报》却是当时全省唯一公开发行的日报,相形之下,私下刻发的揭帖不仅在发行范围上难以企及,公信力也远为逊色,还难保不在散布流传中发生变化。果然,坊间很快开始流传掺杂进污言秽语的版本。<sup>①</sup>如此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已经超过了士人身份所能容许,“新派”立即借势反击。虽然未必如他们一口咬定,始作俑者就是向来甘为前驱的宾凤阳,但“旧派”也实在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加以否认。陈宝箴看到篡改版本的公启后,也勃然震怒,严令宾凤阳到署受询。既然无论如何难以撇清关系,王先谦也只能硬着否认,并以辞去山长作保。虽然不了了之,“旧派”的名誉却大受损伤,在陈宝箴面前再难挺直腰板。体察个中形势逆转,关键正在于就社会覆盖和组织程度而言,“新派”和“旧派”运用的传播工具,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档次。较之《湘报》的堂堂之阵,“旧派”所用传播手段临时随意,在公共宣传中根本无法做到步调一致,言责明晰。从这个意义上讲,《湘报》确是“新派”在失去了学堂,南学会也名存实亡之际,在党争中既是唯一,却也强劲的“利器”。

但“旧派”受创却不等于“新派”收益。报刊这一“利器”固然锋芒莫当,自身存续却需有充分保障。《湘报》却正缺乏充分且自主的经济来源,全靠抚署每月津贴的 200 两才能维持运转。果然,“新派”刚开始在报端痛陈快垒,陈宝箴就明令熊希龄交出报馆,《湘报》不得不在六月初二自动停刊,虽然在六月

十五日一度复刊,但已是抚署的机关报。可以说,经过这番内耗,“新”、“旧”两败俱伤。如果要在戊戌年的湖南党争中找一个赢家的话,截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只能是代表国家的陈宝箴。

综而言之,在戊戌时期的湖南,《湘报》首先是作为维新建设的门类,才能在士绅主持下调用公共资源得以出现。因为在初始阶段,它能给主持者带来的现实收益,并不为士林前辈所需,所以才会由后辈精英分任。然而,随着报刊活动公开、广泛而持续地展开,作为新的传播工具,《湘报》在并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却又逐渐改变了湖南士林,尤其是为数众多的底层读书人的交往状态和聚合方式,构造了新的名望赋予机制,进而对既有的权势格局造成了强劲的冲击。在民间与官方资源都相对匮乏的湖南,这既开启了社会交往状态的重构趋势,又成为士绅党争的诱因和承载。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曾以“镶嵌”(embeddedness)的隐喻来描绘经济行为既深度依托社会结构,又会显现出强烈的自主性,乃至影响社会结构本身。<sup>②</sup>根植于戊戌湖南“新”、“旧”分野、流变,本文对《湘报》面相的研判,亦可说明在既有的社会格局下,新交往工具的引入和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如此机理。

(责任编辑:周奇)

① 据王先谦在《再致陈中丞》中转述,该版本添加的内容大致是说时务学堂教习不端,择堂中弟子文秀者,身染花露,肆行鸡奸。梅季标点:《葵园四种》,第 867 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②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November): 481—510.

## Modern Newspapers and Intellectuals' Ecology in Hunan Province

Zhu Zhigang

**Abstract:** Around 1898, the Xiang Bao Paper formed an new contacts system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 strongly challenged the old communication ord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and caused the intellectuals' quarrel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groups. There was no obvious right and wrong about the two groups, but both sides suffered, and the qualifications and abilities the intellectual circles influence public affairs in Hunan.

**Key words:** Hunan Province, "New" and "Old", group, *Xiao Bao paper*